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早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编委会
江 单 张华勇 黄
浩 李增勇 龚德贤
张邦毛 齐明利 许
平安

顾问 | 邓飞 方智平
李凌
总编辑 | 江 单
执行总编辑 | 张华
勇
执行社长 | 黄 浩
副社长 | 刘 军
副总编辑 | 李增勇
蒋靖善 龚德贤
视觉总监 | 古 风

采访中心
主任 | 董 哲
编辑中心
主任 | 罗 阳
经济新闻中心
主任 | 龙 波
文旅新闻中心
主任 | 许平安(兼)
视频新闻中心
主任 | 罗明荣
区域新闻中心
主任 | 潘利求
评论新闻中心
主任 | 贺 强
国际新闻中心
主任 | 黄 浩(兼)
新闻影像中心
主任 | 巢砾平

驻境外记者
驻澳门记者 | 王 强
驻台北记者 | 李冰洁
驻东京记者 | 向建国
驻新加坡记者 | 毛周
驻新德里记者 | 黄朝
驻阿拉木图记者 | 周
璐
驻耶路撒冷记者 | 贺
友
驻纽约记者 | 罗韵诗
驻开罗记者 | 吴志刚
强
驻莫斯科记者 | 朱可
夫
驻奥斯陆记者 | 向建
军
驻伦敦记者 | 邓联辉
驻巴黎记者 | 卢伟平
驻巴西利亚记者 | 尹
志强
驻堪培拉记者 | 欧阳
子

拒绝应酬被开除，“8小时之外”的权益不容侵犯

2月14日,重庆的小刘入职一家公司,主要工作是处理日常行政和人事事务,其中包括日常接待工作。2月28日,公司负责人要求小刘下班后一起去宴请客户。小刘认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并不包括这一项,因此拒绝。没想到,公司以“不服从工作安排”为由辞退了她,入职半个月来的工资报酬也没有支付。(据3月8日光明网)

仅仅从“不服从工作安排”的角度看,似乎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在

一家单位上班,岂能不听“招呼”?但是,我们也需要看清楚的是,“工作安排”也分为两种情况,一种是“正确的安排”,一种是“错误的安排”。“正确的安排”当然不能拒绝,因为合理合法还合情。但是“错误的安排”就不能来者不拒了,也就没有“听话”的基础了。领导有着领导的权力,但是领导的权力也不是无边无际的,也不是拿来胡来的。

从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看,需要追问的是“8

小时之外的时间”到底属于谁?对于用人单位来说,“8小时之内的时间”属于上班的时间,当然是干工作的时间。而“8小时之外的时间”就不再是上班的时间了,这个时间段是属于职工个人的,这个时间如何支配那就必须是“职工说了算”,而显然不能是“领导说了算”。

当然,“8小时之外的时间”也是可以商量的。比如单位确实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加班加点,这个时候职工也需要

要理解一下。但是即使如此也需要守住一个底线,那就是也需要“与职工商量着来”,决定权依然在职工的手里,因为“8小时之内”的工作职工已经完成了,履行了合约义务。简单一句话:你给的加班费再多,是不是“愿意要”还得职工说了算!又何况,“拒绝应酬被开除”还那么不合情理?“应酬”不是工作的必须,任何人都有权力选择是不是参加,而不是被逼着陪领导喝酒,陪客人唱歌!

现实生活里,侵犯8小时之外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:有的单位规定,下班后手机必须畅通;有的单位规定,下班后的微信群信息必须2分钟回复;有的单位规定,必须无条件随叫随到;有的单位甚至是晚上12点在工作群里布置工作、发布信息……凡此种种,都是在摧残职工的休息权。

“8小时之内”和“8小时之外”的关系必须厘清,休息权谁也不能侵犯!

■郭元鹏

年轻人不愿进厂, 提高就业吸引力为“破局”之道

两会期间,人大代表、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表示,近年来外卖与进工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,因为工厂招工难不能归咎于年轻人流入外卖行业,而是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所致。选择送外卖,只是年轻人基于现有市场环境,权衡过后的一种的自然选择。现如今,可支配时间多、工作灵活自由、即时可见的成就感等更加符合他们的职业价值观。退一步讲,就算他们不送外卖,也会流向网约车、电商、新媒体等新兴行业,进工厂依然不在优先选项之列。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繁荣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,它

(3月5日中国新闻网)
近年来,送外卖以其时间自由度和薪资较高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睐,而相较之下,车间流水线的工作枯燥单一、劳动强度大,还时常夜班倒,但工资和福利待遇却上不去,吸引力显然不如前者。

事实上,送外卖与进工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,因为工厂招工难不能归咎于年轻人流入外卖行业,而是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所致。选择送外卖,只是年轻人基于现有市场环境,权衡过后的一种的自然选择。现如今,可支配时间多、工作灵活自由、即时可见的成就感等更加符合他们的职业价值观。退一步讲,就算他们不送外卖,也会流向网约车、电商、新媒体等新兴行业,进工厂依然不在优先选项之列。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繁荣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,它

的发展也扩大了就业市场,给年轻人带来更加多元的就业选择。

除此之外,当工人的社会认同度依然不高,进工厂更是屡屡被人们抱怨之事,在舆论场中处于不利地位。这样的媒介印象,也会进一步降低年轻人进厂打工的积极性。

再往下深究,招工难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的困境——利润率低,亟待转型。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,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仍没有完成。因此我国距离成为

“智造强国”,仍有一段长路要走。制造业就

业人数自2013年达到后逐步回落,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后制造业的瓶颈。很多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还处于廉价劳动力阶段,就业市场难以与待遇和福利都更好的第三产业竞争,用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缺口。

要想让更多人走进工厂,不能仅停留在鼓励层面,也不能靠阻断他们送外卖的职业选择,而是要努力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,加快数字化转型,增强产业自身的吸引力。只要薪酬待遇提上去,职业成就感增加了,年轻人被“引得来,留

得住”便是指日可待。制造业就业该如何“破局”?这有赖于各方共同努力。国家进一步施行减税降费和财政补贴,助力各类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;企业需改善工作环境、健全奖励机制,增加员工薪酬,使初次分配更注重效率;社会发展职业教育,让掌握高技术的人进入专业领域,也能纠正人们对技术工人的偏见。总之,让制造业度过转型期“阵痛”,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跃迁,全面性、系统化的革新不可或缺。

■席雨晴

规范旧手机回收, 打通信息安全“最后一公里”

全国人大代表、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,建议制定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中长期整体发展规划。当前,公众对信息泄露风险的担忧也不断加深,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电子废旧物回收率难以实现大幅提升。雷军建议,在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各环节中,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操作规范,打通个人信息安全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有效提升电子废旧物回收率。(3月6日澎湃新闻)

随着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日益加快,

被淘汰掉的旧手机越来越多。工信部的报告显示,中国的二手手机存量累计超过20亿部,仅2020年产生的废旧手机就超过5亿部。

由于手机含有金、银、铂金、钯等稀有金属,属于再生性资源,若回收后经科学化处置就能“变废为宝”,减少环境污染。目前,我国二手手机回收市场,多是由手机厂商、通信运营商承担,通过“以旧换新”“官方翻新”等形式,进行回收。

只不过,我国的手

机回收率偏低,正规回收率仅占2%左右。现实中,手机里有照片、视频、联系人、聊天记录等个人信息与隐私。特别是手机早已变成一个“移动钱包”,各种投资理财、银行账户、支付等,涉及个人财产安全,人们普遍担心旧手机回收是否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。

若旧手机回收环节处理不当,很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。权威网络安全专家认为,恢复出厂设置和简单“删除”文件,并不能彻底删除信息。一些不正规的二手手机收购

者,可以通过简单操作恢复“已删除”的个人信息,成为一些不法分子从事电信诈骗等活动的工具,类似案件屡屡出现。显然,个人泄露信息,已变成旧手机回收的“拦路虎”。

基于此,此次雷军提出规范旧手机回收,打通个人信息安全的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建议,非常及时,也非常必要。

一方面,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详细的制度安排,明确回收专业资质认定标准,让专业的企业干专业的事,从而让旧手机回收走向正规

化;同时,在立法方面,应当将二手手机个人信息泄露,列入信息保护的范畴中,提高个人信息泄露违法成本,保护用户隐私权益,用法律之盾来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力度。

此外,用金融、税收、财政等政策优惠杠杆,作为智能手机、电脑等为代表的二手电子产品回收产业“助推器”,从而激发回收企业主观能动性,以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■吴睿鸫

